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為一份綜合性學術文化刊物，內容涵蓋人文和社科，旨在促進學術文化交流。我們歡迎海內外學者惠賜鴻文，共同探討具公共性和現實性的議題。

——編者

人工智能與人文學的明天

在以 GPT 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商業化成功的今天，人們不僅認識到人工智能的潛力，更開始爭論其是否能夠顛覆現有的人文學研究與人文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人文學者開始發表他們對於人工智能的看法。相關討論固然展現了對於社會的關懷，但大多側重於人工智能產品的使用體驗，缺乏對於技術的理解與應用技術的嘗試。王賀的〈「人工智能人文學」的理路、進路與歧路〉（《二十一世紀》2026年2月號）通過全面的學術回顧，以及人工智能在人文學領域研究「能」與「不能」的具體案例，提升了這一問題的討論品質。

文中提到的兩組討論，我認為頗值得學界注意。首先，不論人文學還是科學領域，人

們對於人文學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看法確實存在着差異。限於篇幅，作者未能具體展開討論。但這裏有些有趣的細節，例如不太精通技術的人文學者的辯護，大多集中在人類的獨有價值上，一些科學家則指出了文化與藝術的「不可解釋性」，而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等語言學家則為人工智能冠以「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s) 之名。這暗示了對於人文、科技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實際上左右了不同背景的學者對人文學前景的看法。在這一點上，作者的學術史工作開了一個好頭。

作者還花費了很多篇幅，比較了大語言模型與傳統計算語言學方法在實際研究中的差異，這引出了今日計算語言學領域的最大的分歧：深度學習模型通過極強的預測能力，挑戰了傳統計算語言學以詞法、句法、語義等語法取徑的技術路線，而它們背後本質上則是認識論的差異。認為深度學習模型應當應用到語言研究的學者更多地採取了實證的態度，認為描述與分析現象更加重要，而傳統語言學取徑的學者則繼承了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以來對於語言系統的

關注，更側重於對系統本身的描述，這也是社會科學領域（在量化研究興起後退縮到質性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傳統。

這就牽扯到當前學術界對於數字人文的討論中亟需推進的一個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風靡的「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 論以及波普爾 (Karl Popper)、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等學者從兩個方向對「人文科學」的詰難，即「人文」與「科學」的二分，「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差別，似已成為大多數學術體系下的共識。目前作者對於「人工智能人文學」的討論已經比較全面，在理論建設上成就頗多，但如果能在此處着墨，則更能奠定這些理論工作在人文學界的基礎地位。例如，作者提到的 Stata 和 ChatGPT 配合做數據清洗的研究路徑，究竟是一個「人文」研究，還是一個「社會科學」視域下的量化研究？一個既「科學」又不「科學」的「混合型方法」如何在理論上存在？若能解決這些「深水區」中的哲學問題，將更能使「人工智能人文學」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馬郝楠 香港
2026.2.20

文革與三線工廠的因應

二十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的三線建設包括「大三線」和「小三線」兩個組成部分。其建設內容涵蓋了國防、科技、能源、工業及基礎設施等多個領

域。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備戰活動，「三線建設」這一概念因保密要求而長期鮮為人知。改革開放後，伴隨部分檔案、資料的公開，三線建設被學界所關注。然而，文革時期三線工廠運行的微觀歷史面相仍顯模糊。孫馭坤的〈「抓革命、促生產」下的三線工廠建設——以四川省自貢市東新電碳廠為例〉（《二十一世紀》2026年2月號）以微觀三線工廠為考察對象，細緻利用企業檔案，還原了文革初期東新電碳廠內部的權力結構演變及此間工廠生產的組織與發展脈絡。

本文的貢獻在於將三線工廠建設早期對生產的組織重新置於文革演進背景下工廠內部權力博弈脈絡中加以理解。一方面，通過梳理文革之初東碳廠對革命的因應歷程，揭示了工廠幹部、內遷職工、民工等不同群體對革命輸入的複雜心態。其間，正在施工過程中的職工因共同體意識等因素，對革命輸入呈現了相對溫和的應對策略。另一方面，文章基於對計劃經濟體制下三線工廠生產所需的設備、原材料等供應問題的梳理，闡明了文革造成常規經濟秩序斷裂後，「靠山、分散、隱蔽」的三線工廠面臨剛性生產資源的外部協作、供應困境。這是文革初期三線建設遲滯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東碳廠不僅對革命輸入的反應相對遲滯，甚至在工廠權力更迭中尚可以維持基本秩序。事實上，工廠的造反派組織在文革之初即發展起來，民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革命中的東碳廠

領導機構歷經了「黨委—313兵團—工宣隊/革委會—軍管會/革委會—革委會」的轉變過程，顯然，各造反派間的關係及其組織整合歷程的明晰，對於理解東碳廠權力更迭之邏輯頗具價值。若能進一步梳理文革之初東碳廠內幹部、職工在革命輸入乃至造反派組織中的角色，或可以更好地解釋「抓革命」背景下「促生產」何以可能。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對文革期間政府幹部所組建造反派之影響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

張勝 上海
2026.2.23

獵頭中介的「詭異」邏輯

毛麗丹的〈中國獵頭「做市」行為與員工跨企業流動〉（《二十一世紀》2026年2月號）是近些年來少有的對獵頭中介詳細分析的文章，從文化因素來解釋獵頭如何推動員工流動，頗具新意。文章呈現了獵頭的一個「詭異」邏輯，即打造員工的適度流動，既不能過度流動，也不能不流動，否則就會被「污名化」。換言之，獵頭為員工流動定義了時間、速率、方向，精準地把控員工流動是一般中介和用人企業難以做到的。之所以「詭異」，一方面在於流動是難以把控的；另一方面在於流動可以看作是員工具有能動性的行為，尤其是這種能動性在精英員工的語境下更強。在精準地把控員工流動的背後，又是一套獵頭的雙面邏輯：一面是利他邏輯，充滿了情感陪伴與利他情懷；另一面是利己邏輯，通過打造員工流動來獲取利益。

獵頭與製造業中介有相同與相異之處：一是兩者都會打造勞動者的流動，但獵頭精細地為員工打造的流動，是製造業中介難以超越之處。二是獵頭定義的文化理想（價值體系）是特殊的，在製造業中介中幾乎難有製造價值體系的行動，而這種文化理想又長期影響員工的工作流動。三是從員工角度來看，製造業的勞動者在把握自我流動上至少具有一定的自主權，這似乎比獵頭下的流動員工更有主體性。從中也能看到兩種中介使用策略的差異性效果：製造業中介通過製造「工資溢價」來影響員工流動，但較少影響到勞動者的價值觀念，勞動者慢慢會找回自主權而實現自我流動；但獵頭通過製造「文化觀念」來影響勞動者流動，這種類似霸權的控制讓勞動者慢慢失去流動的自主權。

作者的研究似乎可以進一步拓展：首先，獵頭應該是分布在不同行業的，可以進一步分析獵頭促發不同行業員工流動策略的差異，分析獵頭怎麼定義不同行業的理想員工規範。其次，在敘述獵頭的利他邏輯時，可進一步詳細敘述獵頭的情感策略與員工的反應。因為在底層勞工中，中介可能對勞動者有一種「社會性保護」，情感在其中也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而在精英勞工中，勞動者似乎同樣需要這種「社會性保護」。再次，應進一步構造「不同薪資員工」與「不同級別獵頭」交錯的類型學框架，因為不同級別獵頭對不同薪資員工的流動打造應該是不同的，從而將經濟與文化的因素勾連起來分析。

朱江華峰 北京
2026.2.27